

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杜矢甲

人物介绍

杜矢甲(1915-2000),原名杜刚,北京市人,回族,男低音歌唱家、作曲家。其演唱代表曲目有《淮河船夫曲》《蒙古马》《七枝花》《八路军新四军战歌》《河流水》等自己创作的歌曲以及改编歌曲《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等。



到延安前

杜矢甲1915年3月3日生于北京,自幼爱好音乐。中学时代曾参加李抱忱指挥的合唱团,1932年考入京华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学习小提琴,1934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低音提琴选科,学习声乐及弦乐,师从苏联歌唱家苏石林等,曾在音乐会上演唱歌剧《萨特阔》咏叹调等。1936年又考取声乐选科,并与冼星海一起在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当年上海有位富翁要出资送他去巴黎深造,但在民族危难时,杜矢甲选择了放弃学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杜矢甲先后参加了上海大公报读者会宣传队、湖

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武汉抗敌演剧三队等,并到各地宣传抗战。当杜矢甲随大公报读者会宣传队自芜湖乘船到达安庆后,读到鲁黎所写的诗歌《淮河船夫曲》,激起他强烈的共鸣和创作热情,于是谱出了他的处女作《淮河船夫曲》。他在旅途中到处演唱,受到热烈欢迎。后来在武汉江夏之秋把曲谱送交《战歌》杂志社,于1938年1月发表。冼星海曾当面称赞《淮河船夫曲》是一首优秀的歌曲,有中国民族风格与强烈的时代感,曲调来自民间又有所创新。

延安时期

1937年杜矢甲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教声乐。在赴延安的途中,杜

矢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起,在延安鲁艺音乐系担任主任教员。

1939年1月15日,边区议会开幕,鲁艺在陕北公学礼堂演出了王震之编创的《军民进行曲》,杜矢甲担任歌曲指导并参演角色。他曾于1941年在延安鲁艺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演唱了苏联红军歌曲《我们是红色战士》《穿过海洋、穿过波浪》,穆索尔斯基的浪漫曲《戈巴克》,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选曲,柴科夫斯基的浪漫曲,马斯内的《悲歌》等。在此期间创作了《秋收突击》《蒙古马》《好日子》三部大合唱,音乐剧《蒙古之夜》及歌曲《拿起我们的红缨枪》《雪花飘》《青山青》《延河曲》《选举好人来做官》《八路军新四军战歌》等。

杜矢甲在延安,总是兴致很高,经常披一件羊毛毡大氅,那是他的好友张汀用一块粗毛毯为他做的,粗针大线,却时尚,颇具欧式风格。由于穿着奇特,性格怪异,与塞克、张汀经常结伴散步,号称延安“三怪”。杜矢甲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男低音。有一次晚会上,丁里和杜矢甲合作演唱《囚徒歌》,丁里起音起低,后面越唱越低,眼看要唱不下去了,可是杜矢甲却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唱下去了,得到了观众热烈的掌声。1942年,延安经常在抗大举办外国歌

曲演唱会,杜矢甲的保留节目是穆索尔斯基根据歌德的诗配曲的《跳蚤之歌》。

离开延安后

1945年9月20日,杜矢甲随艾青率领的鲁艺华北文艺工作团前往张家口,后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任声乐主任教员。

1949年他调到中央实验歌剧院。1952年调中央民族歌舞团任创作室主任、声乐指导、艺术顾问。上世纪50年代,由于杜矢甲曾和诗人鲁黎合作过,受牵连被打成“胡风分子”,“文革”中也受到迫害。

“文革”结束后,1978年他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演唱会,演唱了自己改编的花儿歌曲《要为祖国作出新贡献》《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等。1980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副会长。他多次深入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演唱,并收集、改编、创作苗、回、蒙、彝等少数民族歌曲,如苗族歌舞曲《春天来到了》《苗岭山啊清水江》等。发表论文《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等和译文《声乐表演艺术》《柴科夫斯基的音乐》等多篇,创作歌曲30余首。

2000年,杜矢甲在北京病逝。(延安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慧琳)

“一生只干一件事”

——追思北京人艺院长任鸣

新华社记者 白瀛

7月12日晚,北京人艺70周年院庆大戏《哗变》在首都剧场举行本轮最后一场演出;而当天上午,该剧重排导演、北京人艺院长任鸣的追思会在剧院一楼排练厅举行。6月19日,任鸣因病在京猝然离世,享年62岁。

他在近40年的艺术生涯中导演了90余部话剧;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一生只干一件事”。

“18岁时,就确定了自己一生的人生目标”

任鸣的艺术生涯是同改革开放同步的。1978年高中毕业后,自幼热爱文艺的任鸣便立志做一名话剧导演。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79年恢复招生,但三年只招一次,第一年没参加考试,只能等三年。

其间,任鸣认真自学专业书籍,积极寻找实践机会。在中央实验话剧院《鉴真东渡》剧组跑龙套时,他因为认真引起了主演李法曾的注意,被引荐给中戏导演系教师白斌本,后来就经常到课堂旁听。

1982年,任鸣如愿考入中戏导演系。他的同班同学刘伟至今仍记得,入学第一天大家围坐在排练教室作自我介绍时的情景:“一位高个子同学,讲述了自己坚持三年,义无反顾地努力,考入中戏导演系,这是他唯一的志愿、目标,而今实现了。说着,他流泪了,哽咽了,同学们都被他付出的艰辛感动了。”

任鸣不但是这个班级的骄傲,更是无数师弟师妹的楷模。后来成为同事的导演唐烨回忆,她第一次听到任鸣的名字,是在中戏导演系课堂上。“他的名字是被老师提及次数最多的,他的作业常常被老师拿来当范例,尤其是画面小品《小丑与孤儿》,更是作为优秀作业分析,讲解了三节课。”

“我比较自豪自己是在18岁时,就确定了自己一生的人生目标,并且一路走来没有改变,没有任何动摇。”任鸣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我是人艺的儿子”

1987年大学毕业,任鸣进入北京人艺。1994年,34岁的任鸣成为剧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副院长。

1995年,任鸣因导演话剧《北京大爷》一举成名。演出成功后,他到北京医院看望80多岁的老院长曹禺,曹禺握着他的手说了三句话:戏是演给观众看的,戏要让观众看得懂;要坚持人艺风格,但也要发展创新;要好好学学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的作品。

任鸣曾坦言,这次谈话是其艺术人生上的一个转折点,也让他长时间思考怎么传承、发扬北京人艺风格。在他给剧院创作的数十部话剧中,以《北京大爷》《全家福》等为代表的京味题材写实风格剧和以《知己》《我们的荆轲》等为代表的历史题材写意风格剧,分别继承发

展了以《龙须沟》《茶馆》和《蔡文姬》《关汉卿》为代表的北京人艺风格的两条血脉。

任鸣生前曾说:“我是人艺的儿子,人艺塑造了我,我在人艺成长,没有人艺,我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北京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杨乾武认为,一个导演将自己的创作和一个剧院的传统全部融为一体,这是任鸣对中国话剧的独特贡献。

“走近任鸣,是走进一个时代,进而发现时代与戏剧、时代与它的同路人的深层关联。”戏剧学者、《任鸣导演艺术论》一书的作者之一徐健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大潮下,话剧走入低谷。北京人艺副院长冯远征回忆,当时任鸣的同学大多去拍影视剧了,但他始终坚守话剧。“我相信他的一生是幸福的,因为他努力完成自己理想中的事业,践行着自己当年说的那句话,‘一生只干一件事’。”

国家话剧院原常务副院长、任鸣的师兄王晓鹰用“心无旁骛”“鞠躬尽瘁”形容任鸣的一生:非但没有拍过影视剧,甚至到外单位排戏都不多,这在国内当代知名导演中是很少见的。“任鸣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中国话剧事业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给我们留下专注、踏实、善良、纯真的人格风采。他用一生完成了自己的选择,他的离世是一种艺术和生命意义的完成。”

“导演应该活在作品里”

1997年2月,任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但是名要传承北京人艺风格的戏剧创作者,更是名党的文艺工作者。

2003年,任鸣请战,冒着疫情风险投入创作,并带领剧组成员深入街道体验生活,于是有了表现抗击非典的话剧《北街南院》。2008年,正准备带队出国演出的任鸣,从机场回到剧院投入创作,并率领主创人员赴灾区体验生活,于是有了反映抗震救灾的话剧《生·活》。2020年,任鸣再次挂帅,导演了讲述全民抗击新冠疫情的话剧《社区居委会》。

“任鸣同志有着很强的党性观念,在国家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始终不忘党员艺术家的使命担当。”和任鸣共事十余年的北京人艺原党委书记马欣说。

2014年,任鸣成为北京人艺第四任院长。在繁重行政工作的同时,2021年他导演了庆祝建党百年话剧《香山之夜》,为中国话剧的民族化作出了又一次有益探索。这是任鸣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

“任鸣院长说过,‘导演应该活在作品里,作品应该活在观众心里’,说过‘戏在,就会说话’。从这一点上讲,他并未真正离去。”北京人艺党组书记王文光说。

文化视点

什么是国风? 在海外他们以琴声与舞蹈作答

新华社记者 尚栩 杨骏 司源

一身汉服、轻纱遮面,一只中国结、一把古筝,留学法国的中国“古筝姑娘”彭静旋在巴黎塞纳河畔、波尔多街头广场一次次令当地听众折服于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

一跃三尺、凌空劈叉,一把红扇、一副水袖,在英国教学的中国舞者马蛟龙在伦敦塔桥、特拉法加广场一次次让当地观众惊叹于中国古典舞蹈的风采。

到底什么是国风?“我认为的国风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基础,经过现代化创作的一种国有风范。”马蛟龙日前这样回答记者。

七岁习琴,已经在法国求学多年的彭静旋说,她在法国街头表演古筝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分享美好,分享音乐”,“将古筝作为桥梁,让更多的法国人认识和了解我们的乐器”。

回想起第一次在异国街头表演的经历,彭静旋说,当时心里还比较忐忑,选择的曲子是一些中国传统的筝曲,比如《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在后面的表演中,我就加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西方歌曲,把它们进行中西风的演奏”。

“每次演出,观众的反应都很积极,让我深受鼓舞,”她说,“在远处会有小姐姐画我,之后把画送给我,说非常开心能够在美丽的午后与我相遇;还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在听我演奏后说,能够从音乐中感受到中国的山山水水,非常想以后有机会可以去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十二岁习舞,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马蛟龙几年前公派到伦敦教授中国古典舞。他说,开始在英国街头拍摄舞蹈视频属于机缘巧合,当时受疫情影响,他不得不在线上授课,每天还要在家里训练,保持肌肉力量和柔韧性,但家里空间有限,舞蹈动作施展不开。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他在热门旅游景点格林尼治公园拍摄了一段舞蹈视频,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他就此开启了自己的“视频拍摄”之旅。

“现在,制作分享视频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它是向更多观众,特别是海外观众展示中国古典舞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马蛟龙说,“我的每一个视频其实并不是在街头表演,而是我作为中国人,通过手持中国传统道具,比如红扇、水袖,与西方风景和建筑的一种融合,也像是一种不同方式的对话。”

马蛟龙说,他的英国学生们不是专业舞者,在未来的教学中,希望他们不是简单地模仿舞蹈动作,而是将学习中国古典舞作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

对于未来,彭静旋希望能够在学业之余,继续享受街头演出,同时也能把古筝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远古发现

恐龙或靠羽毛保暖 挺过大灭绝!

新华社南京7月14日电(记者 王珏珺)恐龙这一曾经的“地球霸王”早已为人熟知,但它们是如何崛起的?中美科学家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奥秘可能藏在“衣服”里。与人们印象中光秃秃的外表不同,恐龙可能天生就有羽毛。这些羽毛好比羽绒服,帮助恐龙挺过2亿年前导致众多物种灭绝的全球大寒潮,并迅速“上位”成为侏罗纪时期的霸主。

2亿年前的三叠纪末生物大灭绝,是地质历史上五次生物大灭绝之一。当时的地球火山活动频发,火山灰等遮天蔽日。在此后的几年至几十年中,地球表面温度骤降,大量不适应严寒气候的生物迅速消失。

此次,科研团队在新疆准噶尔盆地的野外考察中发现了保存精美的恐龙脚印化石。在2亿年前,准噶尔盆地的古纬度位于北纬71度左右。这说明当时的恐龙已经有一套完备的御寒机制,让它们在寒冷的极地存活。

恐龙靠什么御寒呢?“靠长羽毛。”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沙金庚介绍,恐龙羽毛的形态结构明显不是用于飞行的,最有可能的功能是保暖。

可以推测,正是由于有羽毛保暖,恐龙得以在这场天灾中幸存,并迅速占据灾后的生态“C位”。沙金庚说:“在三叠纪末生物大灭绝后,恐龙体积增大,分布范围扩张,总数量增加了近一倍。2亿年前这场生物史上的浩劫,不经意间却为恐龙打开了通往食物链顶端的大门。从此,恐龙开始了长达约1.3亿年的称霸之旅。”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进展》。

1.4万年前的古人类 “蒙自人”长啥样?

新华社昆明7月15日电(记者 岳冉冉)通过古DNA研究,我国科学家揭开了生活在1.4万年前的“蒙自人”的神秘面纱。该成果14日在线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上。

“蒙自人”1989年出土于马鹿洞,位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经专家鉴定,该洞穴为古人类遗址。经过抢救性发掘,洞中出土了包括“蒙自人”头盖骨、下颌骨、股骨在内的30余件古人类化石,及马鹿、猕猴、黑熊等动物化石。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明介绍,对马鹿洞发现的一具相对完整的头盖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头盖骨主人是一名年轻的女性,身高和体重分别在155厘米和46公斤左右,头骨高度低,深肤色,鼻梁不高,脑容量偏小,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生活在约1.4万年前。“虽然‘蒙自人’处于现代人的变异范围,但形态特征却很复杂。”张晓明说。

为了揭开“蒙自人”的神秘面纱,研究者用“蒙自人”的头盖骨碎片展开了古DNA遗传学分析,发现“蒙自人”是早期现代人,而非古老型人类。研究还发现,从我国南方的云南马鹿洞到北方的黑龙江流域,约1.6万至1.4万年前已经形成了中国人群共享的遗传成分,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线索。

此外,研究者通过建构“蒙自人”肤色基因模式,推测“蒙自人”可能有深肤色,且中国人群“浅肤色”的基因突变最早可能发生在距今约7500年前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这也使得中国人比东南亚人群肤色更“白”。

学习强国 延安学习平台 xuexi.cn 宣传学习分享 展示延安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载体 的重要园地 成就的重要窗口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宣